



上海记忆

那一夜,外滩公园唱响《义勇军进行曲》

■ 邹贻韬

1937年7月9日,星期五。媒体刊登的天气信息显示,那是一个炎热的多云天,最高气温逼近37摄氏度。那天,距离卢沟桥事变刚过去两天。

上海中外文大小报不约而同地在头版放送着中日开战的新闻。战争阴云压迫下,这天夜晚,中国第一座公共园林——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里,一阵阵激昂的高歌回荡苍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 歌声,缘何而来?
1937年7月9日,《大公报》第16版刊出启事:“今晚九时,如天气适宜,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外滩公园举行铜乐演奏,听众免费入场,惟欲租用特备之座椅者,每人纳费二角。”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已明确乐队使命之一为“在市政公园与花园内公开表演”,因此,之前该乐队曾连续多年筹划夏季开放音乐活动,广受乐迷及普通听众的好评。其中,不少夏季开放音乐活动是在老上海各公园内露天举行的。譬如1934年8月,每逢银行休假日,乐队便于当天17时至18时30分在兆丰公园开演。

据1937年6月29日《大陆报》消息,当年的“上海露天音乐季”将于7月1日盛大开启。其间,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将轮流在杰西菲尔德公园(今中山公园)、公共花园(外滩公园)、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三处为民众献上露天音乐会。同一天出版的《字林西报》登载了演奏曲目。依照主办方预案,包括《蓝色的玛祖卡》《波希米亚人》选段等9首经典曲目将在外滩公园奏响。由此观之,7月9日晚外滩公园上演的露天音乐会,无论从组织形式抑或选曲方面看,其实都是一场常规活动。

然而,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注定让1937年7月9日的夜晚难以平静。

当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8家单位联名发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为卢沟桥事件宣言》,疾呼“最近华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这局面直到昨晨敌人在卢沟桥挑畔事件发生,可以说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了!”同样是在这一天,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请援抗日,宣誓:“请援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是夜,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那场普通的音乐会准时奏响。启幕不久后,演出场地周边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合唱,歌声由低渐高,继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

当年7月23日出版的《星华》杂志刊登了见证人“木圭公”(化名)撰写的回忆《救亡的歌声震动每个人的心能》。文章回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阵勇壮的歌声,很激烈地在草地上响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向着歌唱发声处前进。到了目的地,只见十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分为二团,在草地上高唱着救亡的歌曲……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唱完后,接着唱了一支《打回老家去》……不意引起了一行西捕的注目……那位巡捕先生,经过旁观者一度解释后,也

两天前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注定让1937年7月9日的夜晚难以平静。是夜,上海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音乐会准时奏响。启幕不久后,演出场地周边忽然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齐唱,歌声由低渐高,继而盖过了乐手的吹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外滩公园



外滩公园音乐亭内正在进行音乐会

图片来源: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年华”数据库。

不止地去了……伟大的歌声继续,观众们愈聚愈多……”

假若放在和平年代,高唱歌曲打搅音乐会的确实礼。但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青年在外滩公园传唱爱国歌曲的行动其实是“一曲惊醒梦中人”。

2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内,一份编号为“D-7999”的卷宗详细记录了巡捕房处置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歌声事件的始末。

档案披露,7月9日当夜共有20名左右唱歌群众被巡捕房控制,分批带上了两辆警车。在经过所谓“当场教育”后,态度相对温和的被捕群众得到释放,7人则被带回巡捕房接受进一步审查。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毛惠康不过25岁,最小的江永如仅16岁。他们当中有打杂谋生的店小二,有囊中羞涩的穷学生,有跑前跑后求温饱的学徒,没有一位锦衣玉食者。

正是这群生活不那么“理想”的理想者,用救国歌声对抗亡国前夜的靡靡之音,击碎了部分人得过且过、自我麻醉的幻梦。他们有的来自宁波、苏州,有的来自广州等更远的地方,在黄浦江畔一道唱响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时代心声。

令笔者颇为动容的,是7月11日《新闻报》报道,9日晚11时,外滩公园游人散尽,突然间公园附近的黄浦江面上又响起了嘹亮的《打回老家去》歌声。经查,原来是“青年乘小艇

在靠近公园处高歌”。7月18日《社会日报》编辑解释:“那天晚上黄浦江心里的歌声,是逃走的一部分朋友雇了船重新在船上唱的。”

3 这7名青年入狱后,舆论哗然。《绥远西北日报》驻上海记者于7月10日0时54分发出急电:“外滩公园,9日晚有群众高唱救国歌,旋巡捕房派警备车捕去青年六人。”其所获数据虽不准确,但单是“深夜急电”这一条,就足见记者与该报对外滩公园一事的高度重视。随后几日内,诸多正义媒体相继声讨巡捕房,有的还痛斥“租界欺人太甚”,形容此事是“救亡有罪,唱歌被捕,上海外滩公园一幕悲愤剧”。

或是迫于舆论燃眉的压力,又或因中日战事星火燎原让租界方面嗅到了狼烟,巡捕房最终淡化处理,分批次释放了被捕的7名青年,未按抓捕档案所载计划那般提起诉讼。7月23日出版的《电声》杂志交代了青年们的后续:“十几个人里,有一两个立即放出,第二天,其他几个也放了出来,拘在那里的,仅二三人,但是到现在,也释放了。”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9日外滩公园主要歌者同出一校。

1937年7月12日《东方日报》新闻披露:“外滩公园唱救亡歌曲之青年十余人被捕事,已引起多方注意。闻此次被捕青年,均系育才补习学校学生。”量才补习学校,是近代上海传媒大亨史量才依托《申报》于1933年设立的成人教育机构。该校自创办之日起,便由李公朴

亲自掌舵,很快便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平民教育、新思想传播基地。

4 几天后的7月17日,在聂耳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上海爱国人士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大会结束歌。《电声周刊》激情描绘:“末了是台上台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连地唱了三遍,高壮的歌声,也许会在这场窃听的敌人打战!”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出狱时,与前来迎接的挥舞着旗帜的爱国人士一同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报》记者对这一幕记忆犹深,以“七先生出狱时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题发布新闻。

“七君子”出狱之际,抗战宣传氛围转变。公共租界工部局文件显示,1937年8月“解封”后,上海的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活动蓬勃开展。

1937年10月6日,租界内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救国军歌》《一日贡献国家》《五月的鲜花》《保卫中华》《打狼歌》《冲锋歌》《抗敌歌》《打回老家去》等主题鲜明的歌曲。11月13日,稚鸣社广播在当天播送了《长城谣》《救国歌》《杯酒高歌》《大家一条心》《中国少年》《凯旋》《暮寒衣》《新渔光曲》《凯旋歌》等11首救国歌曲,基本覆盖了整个黄金时段的音乐档期。

11月14日,上海《社会日报》感言:《义勇军进行曲》应该说是近一年来,最深入民间的一支歌曲”。

腌笃鲜

黄浦公园的前世今生

黄浦公园园址原是苏州河口的一块浅滩。清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1863年9月30日),英美租界工部局计划改造外滩(今苏州河口至延安路路口)的道路和岸线,工程包括填土以拓宽外滩,整理岸线,在江边辟建人行道,种植行道树。为此,工部局工程师克拉克先后提交了两份整治外滩和苏州河口岸线的报告。

克拉克认为,由于苏州河口的特殊地形,在退潮时,苏州河水流和黄浦江水流产生对撞而在河口外形成漩涡,在河口南侧的水流却相对静止,泥沙不断沉淀成滩,这对于安全航行和稳定岸线都不利。为改善这种状况,克拉克建议构筑外滩永久性的堤岸,并在苏州河口南侧的浅滩上填土,变苏州河口的喇叭形为直筒形,迫使苏州河的水流方向和黄浦江一致,这样,就不会在河口出现漩涡,继续形成新的浅滩。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克拉克的报告,并且打算利用河口南侧的滩地辟建公共花园(公园)。

公园的英文名称为Public Park,中文译名公共花园、公家花园或公园,中国人习称为外国花园或外摆渡公园,大桥公园、外滩公园。1936年9月改名为春申公园,1945年12月21日改名为春申公园,1946年1月20日改名为黄浦公园。公园早期以绿篱与马路相隔,后来逐步修建了竹篱,1924年后建了围墙。约在1932年间,沿黄浦江和苏州河边设置了铁栏杆,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防护墙。

建国初,公园靠两面临江的优越位置和绿化吸引游人。园除树木花草外,只有一间小温室和一间药房,没有其他园林建筑。当时公园的中部和西部、南部有一些灌木丛,沿江是一条大道,路边植一排乔木,树下为木质长椅。约在同治九年,在园中草坪上建造了一个木结构音乐亭,并安装了6盏煤气灯,除冬季以外,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此举行音乐会。光绪六年春,在公园入口处用水泥石块砌了一座假山,光绪八年五月,英商上海电力公司对外供电,年底公园音乐亭安装电灯,光绪十四年,侨民捐资在园南部建喷水池一座,池中为铜铸的两个孩子合撑一伞,水从伞顶端喷射而出。光绪十六年春,拆除旧的喷水池,新建一个六角形钢结构的音乐亭,亭的基座用石头砌成,两边有梯级,四周围以铁链。1936年,园北水池中假山拆除,改筑为十二道喷泉。1937年,音乐亭被拆除,仅留石台基。同年在花园之南部,建造木结构的凉棚一座,作游人平时休息之所,临时又可作音乐亭。

1989年1月11日,公园闭园改建。公园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主体,建塔所需的1100万元资金由全市3700多个单位共99.6万余人捐助。1993年9月27日起公园免费对外开放。

(摘编自《上海园林志》)

消费市场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来到莫斯科

1953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苏联在5年之内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141个大中型项目。虽然中国曾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禁运和封锁,但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周边局势的稳定,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由于我国缺乏在大江上建造大桥的经验,铁道部决定拜苏联老大哥为师,派出代表团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请求苏方对武汉长江大桥初步设计方案进行技术鉴定。

赴苏鉴定小组由彭敏带队,成员共有9名,以技术人员为主,他们是在汪菊潜、梅昶春、胡世佛、王序森等,赵煜澄作为翻译,赵景明、林书环作为工作人员随团前往。

7月的莫斯科,温润而凉爽,美丽而宁静,郁金香正尽情绽放。代表团刚到这里,便被这里的异国景象所吸引,更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面貌所震撼。



章剑华 著

自己独特的装饰,主题画的背后都有一个迷人的故事。

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着手进行武汉大桥初步方案鉴定的准备工作。苏联政府对鉴定工作十分重视,在国家交通部专门成立中国武汉大桥鉴定委员会,古拉梁夫任主席,还指定了25位苏联最优秀的桥梁专家作为鉴定委员会成员。

中国代表团在彭敏同志的带领下,把带来的所有设计方案、图纸和资料,分门别类地送到苏联专家手中,并作详尽的解释,与他们反复沟通讨论。当苏联专家需要我方提供补充资料时,代表团往往是连夜整理准备,及时交给对方。双方专家一丝不苟的态度,使繁复的鉴定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1953年8月7日,苏联铁道部大厦会议室。为期三天的武汉大桥鉴定委员会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的第一阶段是苏方专家根据我方提供的方案和图纸提出各种问题。两天下来,苏方向我方一共提出了53个问题,中国代表团的技术人员都非常诚恳地作了回答,对于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则明确说明请求苏联专家指导。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就中方初步设计中的主要内容进行讨论,作出具体结论。对

于桥址选线,苏方专家一致认为在蛇山与龟山之间架设大桥是合理而可行的选择,但建议微调调整汉阳岸的桥址。而在讨论桥式设置时,对中方原设计中的九孔筒支式钢梁、浮运式架桥方案提出了异议。有专家提出,中国丹东鸭绿江大桥采用的是桁架结构,在朝鲜战争中被炸后梁架坠落,大桥几乎被毁。鉴于这一情况,建议改为三联连续梁,一联三孔,悬臂架架,这样有利于战备之需,并建议钢梁制造精确,做到标准化、样板化,同编号的构件可以互换,以便于以后大桥建设中的大跨度钢梁设计、制造和安装。

会议最后,古拉梁夫副部长讲话,对中方的设计文件给予高度评价和评价。同时,他也指出了方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充分肯定了苏联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希望中方代表团高度重视,对原方案做适当修改调整。

彭敏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对苏联铁道部的高度重视表示感谢,并完全接受苏联专家提出的意见,承诺尽快对已有方案做出修改调整,提供给鉴定委员会做最后的鉴定。

会议之后,彭敏让参加会议记录的赵景明和林书环写了书面汇报送中国驻苏大

使馆,同时组织汪菊潜、梅昶春、胡世佛、王序森等专家根据鉴定委员会的意见修改方案,梳理出九个方面的意见,对方案进行了充实和调整。

鉴定委员会对修改后的方案非常满意,很快又召开了一次鉴定委员会会议,再一次对中国方案进行讨论,大家认为修改后的方案,更加成熟,更趋完美,通过了方案的鉴定。

正在莫斯科率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的滕代远部长,特地抽出时间参加了最后一次鉴定会议。当武汉大桥方案顺利通过鉴定,他特别高兴,向苏方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感谢,并对彭敏率队的代表团的出色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方案通过了鉴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倍感轻松。他们利用回国前的最后几天,到高尔基大街去散步,到书店去购买技术书。每一个人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被周围的景致与气氛激励着,更加向往着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往着自己的祖国也能尽快地蓬勃发展壮大起来。

热情好客的西林一直陪着大家,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下午,他还邀请大家到他家做客,请大家喝伏尔加酒。席间,西林拿出一本崭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彭敏,竖起大拇指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彭敏起身郑重地接过那本书,无限感激地说:“谢谢西林同志!我虽不是保尔,但我会向保尔学习,做他那样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饭后,西林又开车带大家到郊外游玩。大家围坐在草地上,喝着啤酒,说着说不完的话,心情就像眼前这碧波荡漾的湖水一样,清澈而欢畅,不知不觉,太阳落山了,大家站起来手拉着手,欢快地跳起舞来。

(十三)

连载